



在“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战略选择问题” 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罗力

编者按：综合开发研究院李罗力教授应邀于今年 3 月底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体改研究会等单位举办的《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战略选择问题》座谈会。这篇文章就是李罗力教授根据他在会上发言的录音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李罗力教授的发言虽然基本上都是一些评论，并没有就一个问题展开系统论述，但本刊认为他在这些发言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包括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本刊特将其发表，以飨读者。

—

樊纲对 1997 年后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做了很重要的解释。我不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因此我想对中国这 20 多年来的经济变化，做一个“非主流经济学”的判断，用另外一种思维来进行解释，当然这不一定正确，但至少

可以多增加一些思考的角度，我想这肯定不是坏事。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谜，主要是没有把外部的经济因素考虑进来，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支持中国近 20 年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中国的“开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一种只有极个别的地方，比如说沿海几个特区、几个经济开发区开放的局面。那时候，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开始抛弃计划经济并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但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那种自我循环的封闭思维和封闭运行方式，包括那时候所采取的改革思路实际上都没有脱离这种思路和这种运行方式。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开放”并没占有太大的地位，“开放”和“改革”实际上是脱节的。但是后来发现走不出去了，或者说是走到“死胡同”里了。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应清楚地记得，“六四”风波的一个经济导因，就是 1988 年的物价改革“闯关”，导致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潮，致使当时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因而导致广大民众对现实强烈不满，最后成为导致“六四”风波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所谓的物价改革“闯关”，就是典型的用封闭的经济思维模式来处理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失当举措，最后酿成重大恶果。而“六四”风波又在经济政策上引发了另外一个更糟糕的直接后果，那就是长达三年的“治理整顿”。这三年是中国经济的大停滞和大闷局，再加上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加以封锁和包围，如果不是邓小平南巡打破这个闷局和僵局，中国的经济发展真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邓小平南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最大的功效之一就是彻底地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就

是真正把中国的“开放”与中国的“改革”联在了一起。我讲这点是有根据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南巡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把深圳的经验和深圳的模式传播到全国，引发了全国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浪潮，而且树立起中国开放的第二个典型——上海浦东，为中国进入第二轮更高层次的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再回头来看，由小平南巡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开放和引资浪潮，特别是各省市各地区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各种方法和条件大量引进外资，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十多年经济大发展的一个起点。尽管后来出现了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但这些都不能抹煞小平南巡在中国引发的巨大历史转折作用和历史推动作用。

第二，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我每次参加北京经济学家们的研讨会，都感觉到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很忧虑中国的几大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政府体制改革问题、银行呆帐坏帐问题，等等。每次讨论我都会感觉到问题很严重，弥漫着一种很悲观的气氛，困难重重，“黑云压城城欲摧”。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仍然没有解决，有些还越来越严重。但我总在考虑，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总体情况还会越来越好呢？为什么还会快速增长呢？为什么还能在当今世界里一枝独秀呢？开始我还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看就是没有把外部因素考虑进来，总是在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的圈子里打转转，就会越来越悲观，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果把开放的因素，把外资外贸进入的因素，把在开放条件下中国沿海地区超前发展的因素考虑进来，可能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后果。换言之，如果不是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放在一个充分开放和大量广泛引进外资的大环境下面去看，那就确实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存在那么多问题仍然会出现那么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之谜。我很同意樊纲刚才对现在经济形势的判断，我也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良

性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在近十年做了很大的调整，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生产成本有很大的下降，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我觉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不断地采取了扩大开放的政策，不断地在扩大引进外资。

第三，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好处：第一，对外来讲，亚洲市场整个萎缩，导致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第二，对内来说，正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才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走上了扩大内需的正确发展之路。换言之，实际上中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一个应急措施，但是在客观上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四，我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环境变化，再加上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又给中国创造了很多机会；同时中国在这十年的开放和引进外资中，不断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完善自己的国内法规和政策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解决了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并且扩大了中国的内需市场；加之2000年以后，由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萎缩，导致了2001年2002年中国迅速地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觉得把中国最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分析，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谜的东西，就有可能解释清楚了。

二

听了复旦大学华民教授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发言后我感到很受启发。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现在也在研究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从华民教授这样的角度，把中国现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中国整个经济分

析结合起来。我觉得华教授提出了几个非常好的观点：

第一，把沿海都市圈的发展，特别是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与解决我们国家的二元结构问题和总量增长的问题结合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是很有新意的，也是很有启发的。我们过去的研究更多是从一个外向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第二，华民教授把三个都市圈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也是很有新意的。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样的观点和这样的政策在那时是非常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如果当时就想共同富裕，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从现在来说，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考虑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把沿海都市圈的发展，放到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来考虑，这也是一种创新思维。因为一般讲到开发中西部问题时，多数人是从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策、资金向中西部倾斜方面来考虑，没有把沿海三个都市圈的发展与这个目标结合起来，因此很有新意。

第三，我认为华民教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现在国内有一个很普遍的认识误区，认为东部的优势是由中央政策造成的。我在深圳工作，我就很有体会，深圳近年来在国内备受攻击，主要的观点认为深圳一是靠特区优惠政策，二是靠寻租发展起来的，这个观点非常普遍，但却是十分错误的。华民教授认为，实际上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在一种国际分工和在国际分工造成的梯度转移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与此相联系华民教授也提出一个观点，现在应该继续支持东部的发展，继续保持东部的领先地位和作用，继续用东部的领先和东部的发展来带动西部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正确的观点。

第四，华民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很新的思维，就

是东西连动。但东西连动是向西还是向东呢？我同意华民教授的观点，就是要发挥沿海都市圈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要把东西分割开，不要认为东部发展起来了，就只保持它们的外向作用而不考虑它们的内向作用。他提出充分利用现有的三个都市圈的优势，实现资源的流动和要素的流动，而不是主要以中央的转移支付来造成东部和西部的联动，这也是很有新意的观点。

华教授讲的政策建议也很有新意，与他的总体报告是一致的。但是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不同意见。我想讲几个观点。

第一，实际上现在沿海东部地区也有一个梯度转移的问题。80年代先是珠三角发展起来，然后90年代长三角发展起来。目前环渤海都市圈与珠三角、长三角还有很大差别。因此就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实际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在华教授的论文中只做了一种一般性的罗列，我觉得这是不够的，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为什么同是沿海地区，而且环渤海地区中的京津地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北方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但这个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却比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明显的落后和差距，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际上还应有更深刻的原因。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展开这方面的讨论，我们研究院现在也正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第二，我想，即使对这几个都市圈恐怕还要做一些本质上的差别分析。我认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就有不少重大的差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实际上有五个特区，而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就一个都没有。在珠三角地区的五个特区中，其中有两个是特别行政区，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还有三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珠海和汕头。我认为，这五个特区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香港、澳门所起的作用，也要纳入到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视野里来。这一点我觉得国内的

学者，特别是北京的学者过去对这方面关注是不够的。另外，我再次强烈呼吁，不要把“特区”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临时产物，认为现在全国都改革开放了，“特区”的使命就完结了。这是一种很浮浅的认识。事实上“特区”的使命是我们赋予它的，你赋予它使命，它的使命就没有完结；你不赋予它使命，它的使命就完结了。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搞各种各样的“特区”，就是因为中国成功地搞了特区，中国为世界经济创造了一个财富。现在世界上，“特区”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泛化了，很多国家搞“特区”，就是在本国内为了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拿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政策。反而现在我们国内有些人却到处讲特区没用了，使命完结了，这真是荒唐可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三

关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我想提一些看法。首先，我同意上海经济信息中心王德培同志提出的观点，宪政改革现在主要还是民权问题。对于民主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国家体制，包括政党的体制，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采取渐进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超前的、拔苗助长的方式。问题要一件一件来解决。

第二，现在中央政府确实要向地方政府放权，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现在地方政府有很多胡作非为的情况，但是对国家利益来讲，一个积极性不如多放权成为两个积极性为好。

第三，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抓住那些最容易操作、最容易改革的内容先动起来改起来。而现阶段最容易操作和改革的内容，就是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又有两件事最具有可操作性，

一件事是从根本上改变审批制度，从现在的允许性审批制度转变为禁止性和限制性审批制度，也就是说政府禁止什么、限制什么要发公告，要有透明度；然后政府审批就只管这些禁止和限制的内容；对于政府不禁止不限制的内容全部放开，不再进行审批。第二个就是搞电子政务。我认为，电子政务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捷径，用电子政务的方式，把行政执行透明化、规范化，这样就会大大减少权钱交易的空间和黑箱操作的空间，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使政府决策和执行以及监督过程科学化、系统化，同时还可以大大减少政府腐败的空间，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第四，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国家都很羡慕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国家，各级政府能够很快做出决策，而且很快就可以执行，体现出我们这种体制的一种效率和速度。现在这已成为我们的一种优势和一种资源，是别的所谓“民主政体”所没有的资源 and 优势，也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这种体制就很好了，很完善了，这种体制自然有这种体制的弊病，这一点大家现在指出的已经很多了。我在这里只是讲我们也要注意它的另一面，注意到它还有好的一面，不要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总之政府的作用是我们还要大力关注的问题，特别要关注它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不要照搬某些西方国家所谓“民主政体”的模式，片面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而尽力想把政府的作用淡化、退出、甚至消除掉。

四

关于沿海几个都市圈发展问题，我想再补充讲几点。

第一，实际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功能上有一个很大的

区别，跨国公司进入长三角，主要是要辐射内地、占领国内市场；进入珠三角则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世界工厂，作为一个出口加工基地，主要是面向海外出口。

第二，深圳特区将来可以赋予什么样的功能？在新形势下，在中国入世的条件下，应该继续让它具有实验功能，包括各方面的实验功能：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功能，法律体制改革的实验功能，国内服务贸易与国际接轨的实验功能，资本市场特别是离岸资本金融市场的实验功能，等等。

第三，有人认为世界工厂不能解决内需问题，主要是不大划算，大钱都被外国人赚走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从实践来看，就拿珠三角来讲，90年代以后珠三角地区已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基地，创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和工作岗位，解决了大量国内人员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珠三角地区现在富裕起来的人有了购买力，实际上又创造了大量的内需空间和内需市场；另外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也必然是提高我们自身产业竞争力的过程。像家电这样的产业过去全部都是日本的、欧美的，经过一二十年的引进和代工的过程，我们不但引进了资金，实际上也引进了技术，发展了民族工业，提高了民族产业竞争力。现在我们的不少家电企业已经打败了许多国外的企业，我们的不少产品和品牌不但占领了国内大部分市场，而且已经开始走向世界。没有外资引进，没有加工贸易这种看上去似乎不大划算的引进外资方式，我国目前的这种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此文稿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已经本人修改）

李罗力：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地址：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邮编：518029

电话：0755-82487878、82471317

传真：0755-82410997

网址：<http://www.cdi.com.cn> 联系人：郑宇劼 电邮：zyj@cdi.com.cn